

国际传播视域下湖州运河文化的价值重构与路径探索

任广镇 马茗晨

中国大运河“既是优秀传统文化走进人心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明走出国门的重要标识”。面对“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要求，讲好新时代大运河中国故事，亟需通过价值确认与路径创新实现跨文化认同。湖州运河是京杭大运河浙江段的核心河段，其具备独特的历史、地理格局与活态文化资源，可以成为大运河文化的国际传播的微观研究样本。

一、国际传播视角下大运河文化的核心价值确认

1. 湖州运河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活态见证。中国大运河流经35个城市，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组成。京杭大运河进入湖州界后分为三段：西线的顿塘、中线的大运河以及东线的古运河。其中，尤以西线和中线最为集中于湖州区域内。西线顿塘故道保存了自唐代以来的河道结构和相关水利设施，中线的明清古桥与码头遗址则展示了不同时期的工程技术特征。在这些物质遗存的时空延续性的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进一步强化了其历史延续性。以善建华湖笔制作为例，其“择料、水盆、结头、装套”四道核心工序历经千年仍被完整遵循，进入当代，湖笔在材料与设计上进行了大量改良，“在保持传统品种的基础上，开发了大量新品种”，这是大运河文化现代转型守正创新的重要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湖州运河见证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早期连接。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南浔辑里湖丝通过运河运抵上海港后进入全球贸易网络，成为欧洲纺织业的重要原料；双林绫绢的织造技术经运河传播至东亚，影响了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丝织工艺。这种跨区域物质与技术的流通，揭示了湖州运河在全球化初期的桥梁作用。

2. 湖州运河具有深厚的非遗资源的转化潜能。其所蕴含的工艺美学、民俗文化、生态智慧对应了国际受众的审美需求、情感需求与功能需求，展现出显著的跨文化适配性。湖笔的“尖齐圆健”品质标准与西方书写工具的功能美学存在共通性，双林绫绢作为高品质的传统丝织品，其精湛的织造技艺受到国际关注，在国际书画装裱与艺术创作领域具有重要应用。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呈现的“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生态循环模式，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名录，这一农业文化遗产体现了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能够有效呼应全球生态治理的共同诉求，成为东方智慧的典型传播载体。

这些案例提示我们，湖州运河非遗文化天然携带跨越文化壁垒的基因，其国际传播无需从零建构意义，只需在现代语境中重新激活其跨文化基因。通过设计、影像、教育、旅游等接口，传统技艺可转化为当代产品，传统知识可转化为共享方案，传统信仰可转化为共同话题，从而完成从地方资源到全球议题的迁移。

3. 湖州运河以丰厚的民俗文化蕴含全球共情基础。运河沿岸的民俗文化呈现出生产、生活与信仰三大形态交融的独特图景，“根植于沿岸居民的生活、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其深厚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民众的共生关系中”。湖州水网密布、平原广袤，家家植桑养蚕，孕育出辑里湖丝制作技艺、含山轧蚕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蚕桑丝绸”由此成为其鲜明的文化标识，而这些文化标识虽扎根地域叙事，却具备强劲传播动能。以含山“轧蚕花”节为例，其“敬天爱人”的文化逻辑与全球农耕文明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彰显了世俗传统与精神信仰共生的智慧，为不同宗教文化的互鉴对话开辟了广阔空间。

这些民俗活动之所以可以引发共情，在于它们携带的是人类普遍命题，即人与自然的依存、人与人的联结、人与神的对话。当国际受众面对湖州运河民俗时，无需完全理解其地方细节，即可在情感层面产生认同。

二、湖州运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定位

1. 定位依据：世界文化遗产属性与区域文化带建设的共同驱动。湖州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同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意味着湖州运河也获得了全球文化话语权，这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同时，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和浙江省的相关专项政策，也将湖州纳入“大运河文化带”体系。对于湖州而言，通过参与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可以更好地挖掘和展示与本地丰富的运河文化资源，并借此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有调研显示，将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区域文化带建设相结合，可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能够为区域文化带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底蕴和支持；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带建设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

注入新的活力。这种结合有助于湖州运河实现从全球文化符号到本土实践落地的有效转化，最终构建起兼具国际影响力与区域特色的跨文化传播。

2. 定位方向：构建集合“匠心、民俗、生态”的全球文化标识。“匠心湖州”的定位需突显工艺精神的当代表达。以湖笔为例，湖笔制作中“百万毛中选一毫”的匠心理念，可以通过“手工艺精度”的传播价值实现跨文化转译，而非仅强调历史悠久单一特征；“民俗湖州”的建构需突显仪式共享性。含山轧蚕花节可提炼“生命崇拜”的仪式母题，与日本田神祭、希腊酒神节形成主题呼应；新市蚕花庙会的“信仰加商贸”的复合模式，则可对标西方多个狂欢节的多元业态，通过功能相似性降低文化接受障碍，“生态湖州”的标识化需突显智慧输出。桑基鱼塘系统应超越农业技术展示层面，定位于“古代循环经济的东方模式”，其“资源零浪费”理念可与欧洲低碳社区实践构成文明对话，使传统智慧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话语的有机部分。

三、大运河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策略

1. 构建具有主体性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将运河故事融汇成国际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的语言，在核心概念的对外阐释上应超越简单的字面翻译，如对“桑基鱼塘”这类极具地方智慧的水语，可采用更具功能性、普适感的表达。在叙事策略上，需突破将大运河单纯描绘为“古代文明奇迹”的单一视角，转而突出其作为“持续演进的文明载体”的动态特征，展现其从历史延续至今的生命力。这种话语体系的真正落地，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and 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协作”。对于湖州运河的国际传播，应该构建政府、学术界与文化企业三方联动的传播网络，形成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传播生态，推动运河故事在保持文化根性的基础上顺畅融入全球话语体系。

2. 打造面向多元受众的精准化叙事策略。讲好运河故事，需要“充分考虑文化落地受众的身份差异，立足于当地人的审美标准来讲述中国文化，实现对受众文化接受度的精准研究”。对于深耕中国文化的海外汉学研究群体，可以深入挖掘地方档案馆中保存的湖州生丝贸易档案等一手史料，开发专题性学术内容，在严谨的史料基础上搭建共鸣的学术话语桥梁；对于充满活力的国际青年群

体，则需将运河文化符号巧妙融入现代流行语境中，如将蕴含生态智慧的“桑基鱼塘”系统转化为电子游戏的创意原型，让年轻玩家在沉浸式互动中自然感知其可持续理念的价值；在地域传播策略上，对与我们共享东亚文化基因的受众，可以着重唤醒文化亲缘感。面向欧美主流社会，则应创造性地寻找情感连接点。大运河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据统计，全球50余国分布着520余条运河，这些水道串联起3000多座城市与上万个古镇。与西方著名运河打造传播关联，容易在更广泛的人文价值层面建立情感认同。

3. 推动多维度融合的传播渠道创新。打破传统与数字、线下与线上之间的壁垒，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实体空间的在地优势，在运河沿线精心打造集展示、体验与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空间，让来访者身临其境地感受运河文脉的温度与厚度；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其“其传播范围受到地理位置和物理空间的限制”的弊端，所以另一方面，应加强线上传播和数字传播。线上传播除了具有更广泛的覆盖能力之外，还具备超越单向的信息推送，强化交互性与参与感的优势，有助于全球用户在深度参与中理解其背后的文化精神，逐步实现从单向文化输出向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共治的传播新格局转型。

值得参考的是，“李子柒”与“滇西小哥”等系列作品多采用默片式叙事，有效跨越了语言隔阂，显著减少了文化折扣现象。这是缘于“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语言是阻碍信息传递的障碍，非言语的视觉化传播具有较大优势”，因此可以充分借助短视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着力发展以视觉为主导、弱化语言依赖的传播形式，提升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作者单位系湖州师范学院。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对外讲好共同富裕浙江故事叙事策略研究”（Y202454151）、湖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媒介赋能湖州大运河文化符号转译与沉浸式传播路径研究”（25hzghy253）、湖州师范学院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数智赋能·实践融通·‘两山’铸魂：新闻专项课程改革路径研究”（YJGYB2025004）、湖州师范学院教学改革项目“AI赋能马新观教育：‘图谱导航’智教模式探索”（JGRGZN202505）的研究成果。）

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年,理念深刻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艺术乡建正以乡村生态保护为要义,旨在通过艺术创作、文化活动和美学设计实现乡村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者统一,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提供了生动的艺术诠释。当艺术家的画笔勾勒出古村落的崭新风貌,当废弃的工业遗存转型为当代艺术空间,当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融合,乡村的角色便超越了传统的粮食生产地,升华为文化价值的创造源泉与美好生活的承载空间。艺术乡建通过其特有的文化赋能机制,正在重构乡村的价值体系,将绿水青山的自然禀赋,有效转化为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金山银山,实现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发展。

一、艺术激活:乡村价值的再发现与再创造

乡村的绿水青山蕴含着自然生态价值,但价值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激活机制。艺术乡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介入实践,它通过艺术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唤醒乡村沉睡的文化基因,重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安徽黟县的碧山村,艺术家们通过修复古民居、创办书店、举办摄影展,将徽派建筑的物质遗存转化为可体验的文化空间,使原本凋敝的村落成为文艺青年的朝圣地。这种转化不是对乡村资源的简单掠夺,而是通过艺术创造实现价值的增值——青石板路不再只是通行通道,更成为承载乡愁的文化符号;老宅院的天井不再只是采光结构,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叙事场域。

艺术激活乡村价值的过程,本质上是文化资本转化的过程。布迪厄曾指出,文化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艺术乡建的实践中,艺术家们将自身的审美能力、创造技能转化为乡村的文化资本,通过艺术展览、文创产品、乡村旅游等形式,最终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提升。贵州丹寨的苗族蜡染技艺,在现代设计师的助力下,从传统的民族服饰图案发展为时尚界的宠儿,不仅带动了当地妇女就业,更让蜡染文化成为丹寨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这种转化既保护了绿水青山孕育的文化多样性,又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经济动能。

二、生态美学: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艺术乡建区别于其他乡村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在于其对生态美学的执着追求。传统发展模式往往将自然视为资源索取的对象,而艺术乡建则倡导“以自然为师”的创作理念,强调在尊重生态规律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创造。在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艺术家们将稻田、森林、溪流作为创作媒介,作品随着季节更迭而呈现不同面貌,让观众在艺术体验中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大地艺术”的实践,为我国艺术乡建提供了重要启示——绿水青山不仅是艺术创作的背景,更是艺术创作的主体。

生态美学的实践路径体现在3个层面:在空间设计上,强调“在地性”原则,利用本地材料、传统工艺进行创作,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干扰;在艺术表达上,注重呈现自然之美、生态之韵,激发公众的环保意识;在产业发展上,推动生态农业、休闲旅游与艺术体验的深度融合,形成生态友好的产业体系。浙江松阳的“拯救老屋行动”中,建筑师们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对明清古民居进行修缮改造,既保留了村落的历史风貌,又植入现代生活功能,使老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生态文化空间。这种实践证明,艺术乡建可以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让绿水青山在艺术赋能下持续释放价值。

三、社区营造:重塑乡村的社会文化共同体

艺术乡建的核心目标是“建人”,而非单纯的“建物”。它通过艺术活动搭建平台,促进村民、艺术家、游客之间的互动交流,重塑乡村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在福建屏南的前洋村,艺术家们与村民共同创作壁画、举办乡村春晚,将艺术创作过程转化为社区凝聚的过程。原本疏离的邻里关系在共同创作中重新变得紧密,村民的文化自信在艺术表达中逐渐增强。这种“参与式艺术”的实践,打破了传统乡建中“政府主导、村民旁观”的困境,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社区营造的关键在于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艺术乡建不是简单地将城市艺术模式移植到乡村,而是要培育乡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通过开展艺术培训、支持村民创业、建立合作社等方式,让村民从文化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创造者。云南大理的床单厂艺术区,最初由艺术家自发聚集形成,后来通过“艺术家+村民”的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村民发展民宿、餐饮、手工艺等产业,形成了充满活力的艺术社区。这种内生式发展模式,确保了艺术乡建的可持续性,让绿水青山转化的成果真正惠及当地村民。

四、启示展望:艺术乡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艺术乡建在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同质化、商业化、短期化等挑战。一些地方盲目模仿成功案例,导致“千村一面”;一些项目过度追求经济效益,破坏了乡村的原真性;一些艺术活动缺乏村民参与,沦为“精英狂欢”。这些问题警示我们,艺术乡建必须坚持文化为魂、生态为本、村民为主体的原则,避免陷入“重形式轻内容、重开发轻保护”的误区。

推动艺术乡建可持续发展,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支持体系。政府应加强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保护乡村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市场应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培育健康的艺术消费市场;社会组织应积极参与,提供专业的人才支持和创意服务。同时,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不仅关注经济效益,更要关注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社区凝聚等社会效益。只有这样,艺术乡建才能真正成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桥梁,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艺术乡建正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实践价值,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它让我们看到,绿水青山不仅是自然财富,更是文化财富、经济财富;乡村不仅是审美活动,更是社会发展的动能、治理方式。当艺术与乡村深度融合,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绿水青山必将转化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山,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的艺术力量。

（作者系湖州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教授）

艺术乡建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陈屹 毛攀云

殷荣林

协同治理与“生态共同体”的构建研究

时至今日，社会治理创新仍是当下一个热点话题。我国社会治理模式从原先传统的政府单边化模式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合作。无论是社会矛盾化解、经济转型升级还是生态环境治理，都开始走向多元化协同合作的路径。多元协同治理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越来越显得复杂而交织化；政府角色转型有利于实现公共事务治理的跨界合作；开放的跨界合作可以提升治理质效。跨界合作的形态主要表现为：政府与辖区内社会力量合作，政府与辖区内企业的合作，还可以表现为横向向政府间的合作，横向向政府间合作在我国已有较多成功案例。协同理论认为，千差万别的系统，尽管其属性不同，但在整个机体中，各个子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如不同单位间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部门间关系的协调，以及系统中各要素相互干扰和制约等。在今天，由于世界各国间、国内各省际间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合作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因此协同治理与共生发展是必然趋势。

地方政府间合作及行政资源的高效利用，是推动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和社会治理的关键，这是被当代治理实践证明了的事实。但是，在当时共同治理太湖生态环境进程中，尤其是交界面水污染治理，政府间

合作曾遇到过一些问题，跨界治理也存在一些困境。

比如，跨界协同治理缺乏法律法规支撑。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区域公共事务治理层面缺乏跨界合作的法律依据，导致地方政府合作缺乏动力和安全感，一旦出现问题，有时找不到相应的国家法律依据，所以法律制度的缺失是限制地方政府有效合作的主要障碍；第二，地方干部绩效考核制度还有提升空间。较侧重于GDP规模、财政规模与投资规模的考核，对于治界内生态保护相对还不够。

比如，跨界协同合作缺乏平台支撑。区域政府之间的合作不仅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还要有实施具体合作事项的组织载体与平台，“一个组织一般被看作是一个决策单位，对资源的控制由组织决定，制度的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如，跨界水污染等区域公共问题的存在，需要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通力合作，而目前我国在公共事件治理方面组织形式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合作松散没有制度化的议事和决策机制，也没有建立稳定的组织机构，一般采取集体碰头磋商的形式而没有系统化的协同工作机制。这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很难在重要事项上达成一致，从而产生治理的“公地困局”。

就公共事务治理，地方政府合作的制度创新应突破以行政区划为

单位的刚性束缚，确立共治共享的新理念，探索建立开放的治理格局。就太湖水域的治理，环太湖各省级地方政府应在“江南水乡文化”理念指导下采取协同行动、共同保护，建立超然的组织载体推进治理。

建立跨界联动的大环保工作机制。太湖治理中苏浙沪合作进行了开放式探索，建立了环太湖五市行政首长的定期会晤机制、部门会议机制等。为保证工作实效，对于区域间生态跨界合作治理，应设立超区域政府的、能独立运作的生态型机构——“生态共同体”，并设立经常工作的常设领导机构，明确工作机制、工作制度、工作职责。在常设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各区域单位保持热线互动、经常联动，分头办公但要保持同步工作，做到“形散神不散”，利用大数据系统平台共通共治。

落实完善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在制度安排方面，对于生态共同体内部任何主体的行为应通过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约束。生态补偿机制的总原则是“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突出了生态责任的承担。在实践上，2008年初江苏省出台了《太湖流域环境资源区域补偿试点方案》，“方案”明确上游辖区政府与下游辖区政府对于水源保护的责任，上游区域入河、湖流水

质超过断面控标的，按规定向省级财政缴纳补偿资金。这是江苏省在其域内开展生态治理时实施的补偿制度安排。实践证明，这种制度设计是成功的，生态补偿机制完全适用于“生态共同体”架构的实践，对共同体内各单元在生态治理、生态保护方面表现进行奖励。

继续优化和完善绿色政绩考核机制。考核机制是一个导向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指挥棒”。考核机制不够优化，必然要导致执行单位工作走偏。建立科学、全面、公正的考核体系，实行绿色生态考核，考核时注入绿色发展指标内容，并落实实行“绿色审计”，这样才能催生相互合作的自觉性冲动，这在浙江省某些县市生态治理实践中得到明证。

设计保障“生态共同体”高效运行的法律框架。在目前中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任何社会事务治理都需要健全的、科学的、公正的法律制度作支撑，生态治理也是一样。这种制度安排与相关法律应该由区域性共同体的常设单位和上级部门共同参与制定，给出合理的制度设计，对生态共同体中所涉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惩罚与奖励、合作机制等要作出明确规定，让“生态共同体”相关方产生责任压力和工作动力。

（作者系长兴县委党校高级讲师）